

中国古代生活丛书

中国古代的纳税与应役

· 陈 明 光 ·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中国古代生活丛书

中国古代的纳税与应役

· 陈 朋 光 ·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1996年·北京

《中国古代生活丛书》

主 编 李学勤 冯尔康
副主编 李思敬
编 委 王齐* 冯尔康 李学勤
李思敬 李 乔 任雪芳*
任寅虎* 常建华 彭 卫
(※为常务编委)

ZHONGGUO GUDAIDE NASHUIYUYINGYI

中国古代的纳税与应役

作 者 陈明光
责任编辑 任寅虎
封面设计 于名川
封面绘画 楼家本
出 版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北京东四南大街 85 号 邮政编码 100702)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
发 行 新华书店
字 数 100 千
开 本 850×1092mm 1/32
版 次 199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3-026-5 /K·14
定 价 10 元

序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的这套“中国古代生活”大型丛书，是适应社会文化需要的新举措，也是进行学术领域开拓的新尝试。

让我们从学术界一直在讨论的“史学危机”谈起。

历史学本来是人类最早建立的学科之一，我们中国人尤其重视历史，从远古的时候便设有史职，编写历史。在传统的书籍分类中，史书占了一大门类，历代官私所编史书真是汗牛充栋。正因为这样，有的外国学者把中国人称做历史的民族。可是就是这么一门渊源悠久、根柢深厚的学问，在近若干年竟遭遇到种种的障碍和曲折，“史学危机”之说在高校里和社会上却很流行。历史学怎样适应社会的要求，怎样摆脱困境而重新振兴，成了有识之士共同关注的问题。

当然，历史学的命运不是没有转机，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这一古老学科已经逐渐转向于一些新兴的分支。其中很值得注意的，有文化史和社会史。文化史、社会史并非新的创意，但过去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走向发达乃是近些年的事。文化史的起步要略早几年，大家记得，由于关心中国

传统文化的性质和特点，社会上曾出现所谓“文化热”，这影响到历史学界，文化史的讨论也热起来了，有关论作一时风起云涌。最近这种热虽然凉了一点，可是专论中国文化的期刊越来越多，内容也更趋扎实。看来文化史的研究是在深入发展，而且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社会史的开始盛行，可能与历史学的视野渐次拓宽有关。过去比较长的时期，对古代社会的研究集中于社会形态，现在则加强了社会结构的分析与社会现象的探讨。这样，有着新的面貌的社会史令人刮目相看。全国性的社会史的研讨会连续举行几届，盛况空前，是这方面进展的明显标志。社会史的研究，现在正是方兴未艾。

社会史这一学科领域的拓展，很自然地引导大家注视历代社会的生活状况，试图重现当时生活的图景。从这个意义来说，社会生活研究应该是社会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忽略社会生活研究与文化史的联系。文化史深入发展有两个相辅相成的趋势，一个是追索更核心的文化，从而走向学术史、思想史。一个是探讨更广泛的文化，于是走向社会生活的研究。通过古代社会生活的研究，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传统文化的广泛表现。

社会生活的研究，一个特点是多角度、多层面，因而是非常富有趣味而引人入胜的。应该指出，中国传统的史书，尽管数量浩繁，世间罕有其比，然而内容最缺乏的，就是涉及社会生活的部分。以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二十六史）为

例，从本纪到列传，不是太偏于国家政治的活动，便是局限于具体人物的事迹，惟独对社会的生活这一方面，所用笔墨甚少。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今天着眼于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生活是多么必要。

生活的研究过去一直被漠视，是有着文化和思想的原因的。中国的传统思想有时也说人伦日用无非是道，但这不过是强调道的普遍性，不是重视社会生活的意义。史书应当论述的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不同寻常的事迹，而日常生活平淡琐细，不足为训，怎么能载入青史？因此我们在高文典册中看到的，并不是当时社会真实、整体的面貌。

不能反映社会全貌的历史，是没有深刻性的。社会上对历史学作品的不满意，常常就是因为这些作品不够深刻，而且不是有血有肉。其实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最为曲折多变，中国传统的文化也最为丰富多采，并且独具特色，历代的社会生活自然很需要探索研究。

古代社会生活，包括各个时代、民族、地区、阶层和群体的生活，这是历史学一大块几乎空白的领域，其中蕴含着许许多多广大读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开展古代生活的研究，历史就变“活”了，变得更有血有肉，更完整全面。

生活的状态，随着时间长河的流逝而不断变迁。历史上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差异之悬殊会引起大家的惊诧；同时由于中国历史传统的绵延不绝，历代社会生活中又有共通的东西，共通之普遍也会引起人们的惊异。

中国疆域辽阔，自古以来是多民族、多地区的国度。这种多样性，既贯穿于文化中，又体现在生活上。阐明各民族、各地区生活的异同，是极饶兴味的。这里说的地区，不只是地理上的，也兼指文化上的，即文化的区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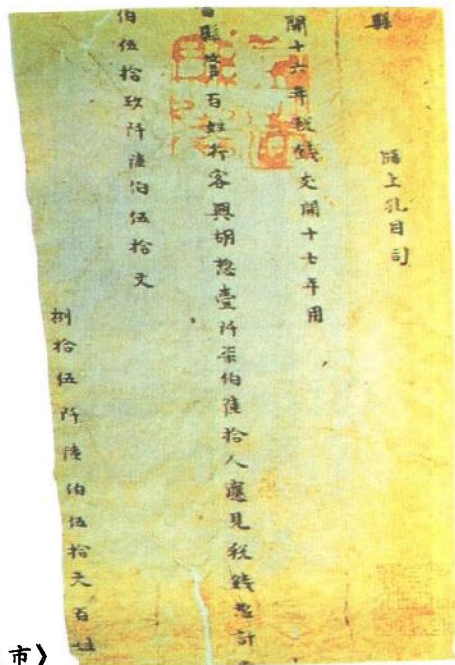
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生活，自然要有明显的差别，分别详加探讨，更有各自的难处。例如宫廷的生活，历来为民众所关注，近几年出版了不少论著，实则这方面的研究很不容易。唐代白居易作《长恨歌》，还有人说他是外朝小臣，不能深知宫闱生活的真相。与此相对，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特别那些被槟于“良人”以外的人们的生活，研究起来就更为困难，需要学者投入更大的力量。

社会生活的研究又需要与一些现代的人文学科相结合，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等等。还有考古学，所接触的也是古代社会生活的遗迹。研究古代生活确实是一种新的学科分支，会给大家带来重要的新知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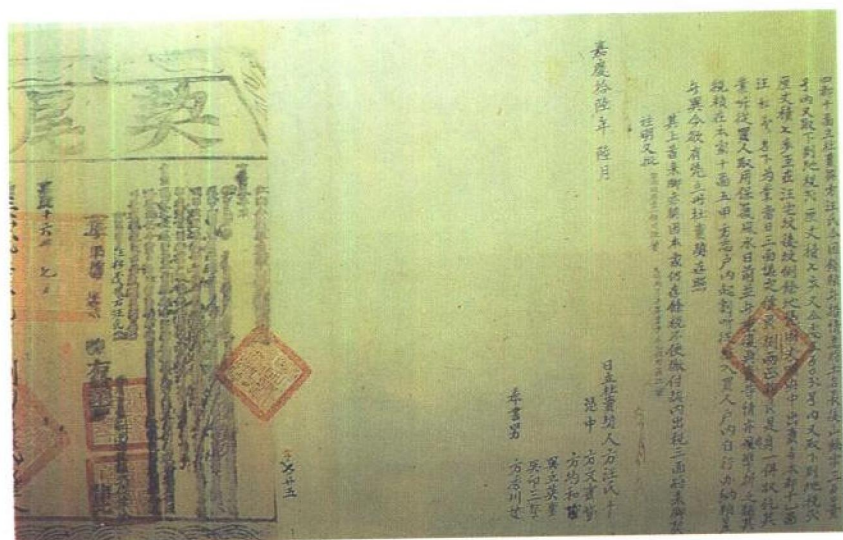
考虑到古代社会生活范围宽广，内容丰富，我们组织了这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约 50 种。将在一年内出齐。所列各种专题，是经过反复斟酌的，希望能比较普遍地揭示古代生活的各个方面。诚恳欢迎读者对这套丛书的设计和组织的，提出宝贵的意见。

编辑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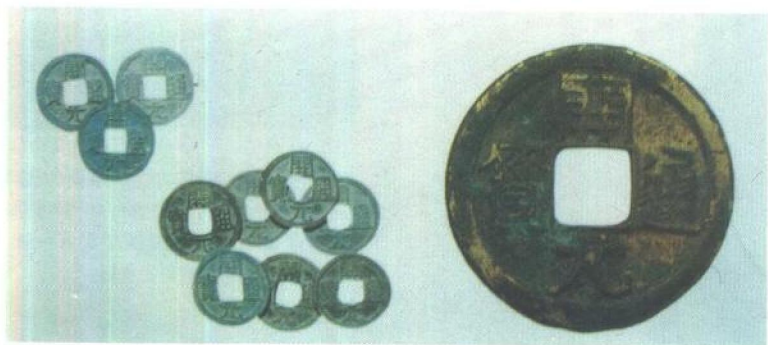
一九九四年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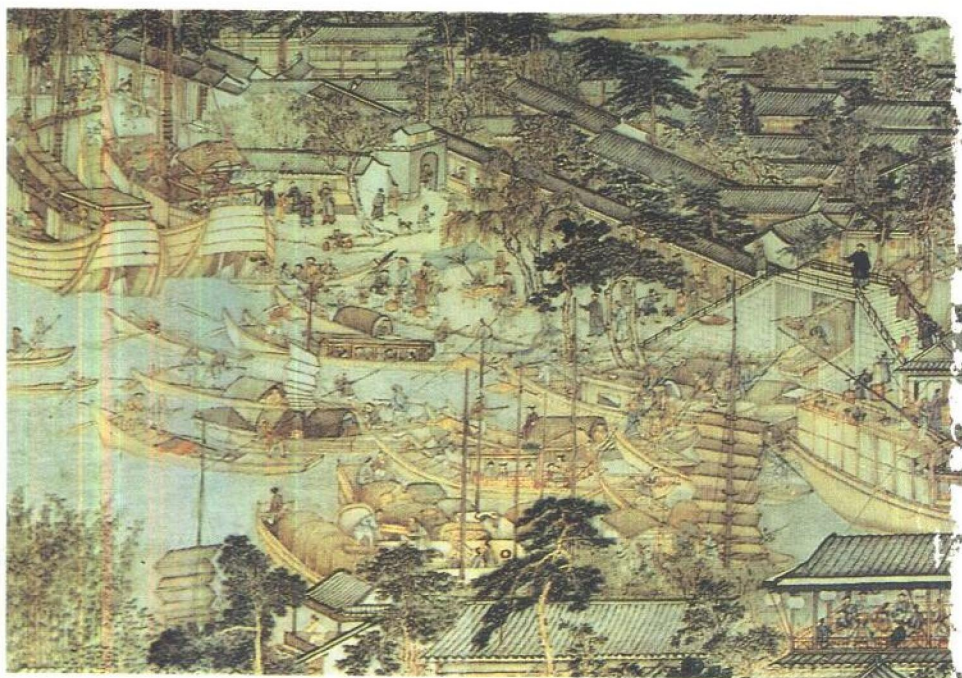
載有稅款規定的唐代文書
采自《中華古文明大圖集·通市》



清代載有稅款條文的地契
采自《中華古文明大圖集·通市》



开元通宝钱
采自《中华古文明大图集·通市》



漕运 ([清]徐杨:《姑苏繁华图》)
采自《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神农》

目录

一、赋税力役的演变	1
1. 赋税力役的起源	1
2. 税、赋、役的演变	3
(1) 地税(田赋)的起源	3
(2) 军赋的出现	8
(3) 力役之征	10
(4) 税、赋、役的合一	11
二、人丁与资产的调查	
—— 纳税应役的依据之一	16
1. 人口调查	16
2. 田地的调查与登录	28
3. 家产的评估	34
三、社会等级的贵、良、贱	
—— 纳税应役的依据之二	39
1. “贵者”的赋役优免	40
2. “贱”民的应役	55
3. 元朝和明朝的“诸色户计”	60

四、田赋的纳税通知、完纳手续和完纳凭据	66
1. 纳税通知的演进	66
2. 完税凭据的给付	86
五、兵役、匠役和一般劳役的应承	96
1. 兵役的应承	96
(1) 秦汉成年男子轮服兵役	96
(2) 唐代府兵与兵募的应役	99
(3) 元明两朝“军户”的应役	103
2. 匠户的应役	107
3. 一般劳役应承次序的编排	111
六、贪官污吏与平民百姓的纳税应役	120
1. 中央和州县不法官员的“有法不依”和非法加征	121
2. 县吏、仓场官胥的舞弊与勒索	127
(1) “浮收勒折”	129
(2) 勾结揽户共同勒索	134
(3) 私立“常例”、“陋规”	138
3. 乡官里胥的敲榨勒索	139
七、苛重的赋役与农民的抗争	143
1. 短暂的“轻徭薄赋”	143
2. 赋役苛重与农民的逃亡、起义	148
主要参考书目	154

一、賦稅力役的演變

1. 賦稅力役的起源

为什么中国古代人们要納稅應役？为什么那时民间把納稅應役称为納“王賦”、應“王役”（如唐代）或“納皇糧”、“應皇差”（如明清时期）？要回答这些问题，就牽涉到賦稅和力役的起源問題。

直观来看，古代的納稅應役是人们向官府提供物力和勞力。實質上，这是国家对社会剩余产品或剩余劳动的特殊分配形式。納稅應役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社会剩余产品的出现，二是国家的产生。也就是说，賦稅力役不可能是和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而是人类原始社会之后的产物。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的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物质极端匮乏，人们只能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当时既没有剩余产品，也没有阶级，更没有国家，所以也就不具备征调賦稅力役的可能和必要。

到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阶段，人类已经艰难地跋涉到文明社会的门槛之前。农村公社具有公有和私有两重性。当时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基层组织单

位，在公有制的躯壳内，私有财产开始出现，阶级分化初见萌芽，公共权力也初步形成。这时，为了维持公共权力机关的活动，满足公共事务的需求，已经出现了赋税力役的雏形。不过当时的“赋税”表现为力役形式，即共同耕种公有地。这从我国民族学资料中可以获得印证。例如，云南省西盟佤族的某些村寨在 1949 年之前仍生活在农村公社中，为了应付村寨公共事务（如祭祀、防御入侵等）开支，他们除了由各个家庭自由献纳以外，主要的和稳定的经济来源是依靠共耕所得，即开一片荒地，由各户出劳力义务耕种，收获归村寨公有。从云南勐海县布朗山的布朗族的农村公社发展史来看，随着村寨中贫富分化的加剧，富有者渐渐控制了行政管理权力，并逐渐把自由献纳变为按户规定固定数额的摊派形式。这也是赋税的一种雏形。

国家诞生之后，为了养活大批的军队、官吏以及满足从事公共工程（如兴修水利、修筑城堡和道路等）的需要，就必须筹集经常性的经费，因此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三个基本特征的赋税力役也随之产生了。换句话说，征调赋税力役是具有强制性的政府行为，纳税应役是公民对国家必须承担的义务。

大约存在于公元前 21 世纪到公元前 17 世纪的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政权。《尚书·禹贡》开宗明义地说：“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就是说大禹在治水之后，把天下划分为九个州，根据各州地力和产品的不同，规

定了不同的贡赋物品。大禹治水成功之后，继承了部落联盟首领的职位，被先秦人尊为夏朝的建立者。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也写道：“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意思是说在夏朝前后才开始有比较完备的贡赋制度。这两种说法都把中国古代赋税力役制度的起源追溯到夏朝的创立者禹，基本符合中国历史上国家和赋税力役起源的客观事实。

在中国古代，国王或者皇帝是国家的人格化象征，唐人把所纳的税称为“王赋”、应承的力役称为“王役”，明清时期民间把纳税应役称为“纳皇粮”、“应皇差”，其实都是把纳税应役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通俗说法。

2. 税、赋、役的演变

我们今天所说的“役”指兵役或劳役，所说的“赋税”二字则是同义反复，是对税收的泛称，并非特指某项税种。可是，在汉代以前，“赋”和“税”仍是内容不同的两种税收项目；而直到清代前期“摊丁入地”之后，税、赋、役三者才最终完成其漫长的合、分、合的演变过程。

（1）地税（田赋）的起源

“税”字的出现较晚，迄今在殷墟甲骨文和商周金文中还没有发现。最早的税字见于《春秋》鲁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即按亩征收实物税。也就是说，这里的“税”是以田地为征收对象的一种税项，后人称之为地税或田赋。

不过，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尽管“税”字晚出，以土地

为征税对象的税项实际上自夏朝以来就出现，只不过它一开始是与井田制联系在一起的力役形式而已。

一般认为夏、商（约公元前 17 世纪—公元前 11 世纪）、西周（约公元前 1027—公元前 771 年）是中国历史上奴隶制时期，当时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所谓井田，就是像“井”字形的方块田。在农村公社时期，土地属于公有，公社成员平均地从公社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耕种，过了一年或两三年又重新分配一次。为了便于分配，就必须把土地划分成一个个的等分；同时，出于耕种的需要，在田与田之间要开沟灌溉和辟路行走，这种沟或路也就是田界。如果取其中一部分来看，这些田地的界划就像汉字中的“井”字形一样，所以被叫做井田。孟子曾对井田制作过理想化的描述，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意思是说，在 1 里见方的土地上，以 9 个百亩为 1 井，其中 100 亩为公田，周围的 800 亩为劳动者的私田；劳动者必须共耕“公田”，而且必须首先做完“公田”上的农活，才能到自己的“私田”上耕耘。

当然，“井田”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实际上它的土地分配形状不可能像孟子说的那么方整划一。不过，孟子所指出的“公田”与“私田”之分，确实是井田制的一个带有本质性的特征，由此便相应地产生了井田制下的特定的赋税力役形式，孟子称之为“助”。助又称藉。赵歧在《孟子注》说：

“藉，借也，借民力而耕公田之谓也。”这与孔子所谓“藉田以力”、汉代儒生郑玄所谓“公田藉而不税”，说的都是一回事，指的是强制奴隶或者农奴到公田上劳动。因此，井田制又被称为藉田制。“同养公田”就是最早出现的土地税形式，国家从公田上所得的农产品就是税物。也就是说，劳动者在公田上应役也就是纳税。所以，汉人许慎在《说文》中将“藉”字径释为“税”，是有道理的。

在以木、石为生产工具的奴隶社会初期，由于劳动效率极为低下，劳动者在“同养公田”时，有时依靠大规模的集体耕作才能完成劳动任务。《诗经》中有“千耦其耘”（《周颂·载芟》）、“十千维耦”（《周颂·噫嘻》）的描写。耦即二人一组协作劳动。可见在公田上的集体劳动场面有的时候相当可观。

随着生产力的缓慢发展，以一夫一妇的个体劳动家庭为纳税应役单位逐渐成为可能。从目前的文献看来，西周的主要生产者被称为“庶人”或“民”，他们就是奴隶。他们是如何“同养公田”及服徭役的呢？从《诗·邶（bīn 彬）风·七月》的描写中可略见一斑。诗中说道：

三之日于耜，（正月时修理农具）

四之日举趾；（二月时开始耕地）

同我妇子，（带上妇人小孩）

饁（yè 叶）彼南亩。（把饭送到田间）

这说的是他们必须自带小农具和饭去公田耕作。

诗中还提到这些“农夫”除了在公田劳动之外，还要服各种徭役。

上入执宫功，（还要进城修理公家的住宅）

昼尔于茅，（白天割茅草）

宵尔索綯（táo 淘），（夜晚搓绳索）

亟其乘屋。（赶快登屋修缮）

他们以及妻子女儿还要为奴隶主准备各种衣料，如：

八月载绩，（八月开始绩麻织布）

载玄载黄，（把它们染成黑红色和黄色）

我朱孔扬，（那染成朱红色的特别鲜明光亮）

为公子裳。（给贵族子弟做衣裳）

……

一之日于貉，（十一月里去捕狸貉）

取彼狐狸，（把那狸貉皮剥下来）

为公子裘。（给贵族子弟做皮衣）

自西周末年以来，由于铁农具和犁耕的逐渐推广，个体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的农业税形式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出现了“民不肯尽力于公田”（《公羊传》何休注）的现象。结果，放眼望去，公田到处杂草丛生，“唯莠骄骄”、“唯莠桀桀”（《诗·齐风·甫田》），生产效益明显下降。这大大减少了奴隶制王国的财政收入，也严重损害了各级贵族的经济利益。奴隶主们不得不放弃“借民力以治公田”的剥削方式，另寻途径，国